

匈奴帝国建立前后的文化分布与传播

翟晓兰(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员)

摘要:关于匈奴帝国建立前后的文化分布与传播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考古发现的匈奴文物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匈奴建国前后的文化分布与传播的复杂性。匈奴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势头及其与周围文化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在其势力上升阶段,作为强势文化,它呈现出扩张、主动影响的趋势,当文化渐呈弱势,它就表现出萎缩、被动接受影响的态势。

关键词:匈奴 文化 分布 传播

匈奴是北方草原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强大帝国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里,曾经驰骋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对古代中国历史以及中亚、欧洲史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关于匈奴历史诸问题,国内学者以马长寿、林幹为代表,作过详细的探讨。但由于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总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模糊和被歪曲的,往往偏重于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方面,并且对其早期活动的记载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而有关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记述尤嫌不足,更遑论其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了。对于匈奴文化的分布范围的研究关系到匈奴民族起源的重大学术课题以及不同时期统治疆域的变迁,我们只有结合文献记载,并更多地依靠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来补充、修正,使二者互证才可能得到更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结论。

据统计,匈奴建国前的墓葬在我国境内已发现近20处,秦汉时期匈奴的墓葬在蒙古境内已发现30余处,约2000座,已经发掘的约500座;在外贝加尔地区发现近900座,已经发掘近400座;城址近20处;在我国黄河流域发现匈奴墓葬约10处(包括南匈奴墓地),发掘匈奴墓葬近百座。这些遗存大致勾勒出匈奴各时期疆域的变迁、文化的分布与传播情况。

一、匈奴立国前的文化分布与传播

《史记》记载,匈奴是被放逐北野的“夏后氏之苗裔”,也就是说匈奴是中原华夏民族的一支,“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1]且把先秦北方诸族统算作匈奴的前身。其活动范围限于阴山至陕西、山西、河北北部一带。然而大量中外考古资料证明这种华夷一体的思想并不成立,因为匈奴主体人群是由北

亚蒙古人种构成,与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诸戎狄有明显区别,很可能匈奴人群在境外度过其童年时代,约于春秋晚期之前南下长城地带后才逐渐壮大起来,也才出现在中原王朝的视野中。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出现的“匈奴”名称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从文献记载来看,匈奴当时主要活动在漠南长城沿线,置王庭于漠南(今内蒙古包头市五原县西北的头曼城),战国晚期以阴山一带为政治中心,但四周以及漠北单于庭情况则史无记载。

目前已确认的早期匈奴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阴山南麓、河套地区,如伊盟杭锦旗桃红巴拉、伊金霍洛旗公苏壕、凉城县崞县窑子、饮牛沟墓葬和林格尔范家窑子铜器群等。这些考古资料为我们展现了公元前5—3世纪从蒙古高原到外贝加尔广阔分布的石板墓文化与秦汉时期匈奴文化的密切联系。前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地域范围大体一致,有着某些一脉相承的文化因素。道尔基、苏荣等学者认为它们与匈奴文化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很可能也是组成匈奴联盟的重要早期成员,甚至其中某一支就是构成匈奴主体民族的先祖。^[2]近年来,蒙古高原呼尼河畔早期匈奴帝国大型贵族石砌多室墓为我们寻找匈奴主体文化起源提供珍贵线索。匈奴核心文化的最典型特征即以石头砌筑墓壁。这类墓葬的最早形式见于图瓦地区的艾尔米雷格墓地、白达格号墓地和恰斯卡尔号墓地,时代或可早到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匈奴—萨尔马泰时期。笔者认为匈奴主体民族可能起源于漠北,过着逐水草游牧的生活,因为地处遥远、力量弱小而不为中原人所知。只有当他们南下占据阴山和鄂尔多斯地区的肥沃土地,与先进的农业文明发生接

触，依靠阴山为根据地、以南部黄河流域足够的粮食来源为依托，她才最终能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被冠之以“匈奴”的强大联盟，而此时的匈奴文化已是一种融合了自身因素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以及中原汉文化某些因素的全新的文化。

中国境内前匈奴遗址的发现对于匈奴文化起源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目前匈奴文化遗存中具有完整清楚的序列的唯一地区，至少证实匈奴文化的发展壮大是在阴山、鄂尔多斯地区，这一地区构成匈奴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匈奴文化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一地区先匈奴文化对于探索匈奴文化的起源、匈奴主体文化的构成因素都是极具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阴山确是匈奴文化的摇篮，这里曾是匈奴极盛时期冒顿单于的军事基地，也是其父头曼单于的政治中心，对于匈奴这样以战争和军事征服为职业的国家至关重要。

春秋战国时期漠南和漠北游牧文化遗存虽然存在墓葬结构的某些差别，但在葬俗和随葬品方面反映出的明显的共性，说明两者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经济形态、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十分接近。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开始的密切接触和文化交流与融合造就了大漠南北地理单元整体的形成和文化的整合，至战国中晚期逐渐形成庞大的匈奴部落联合体，为后来匈奴联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强大后的匈奴民族不断扩展，与华夏民族的北方边境犬牙交错地分布，屡次南下侵犯，秦、赵、燕三国被迫筑长城以拒之，赵武灵王不得不效胡服骑射与之对抗。这一时期匈奴的南部边境随着双方力量的不断消长而不断变化，长城沿线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秦时，匈奴失去肥沃的河南地而被迫北徙。秦连接原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修缮扩展为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战国晚期以后，阴山以南的匈奴文化遗址大为减少。

在中原和周边地区出土的具有匈奴特征的实物遗存，更充分反映出匈奴文化对外交流的活跃及其在中国北方地区强大的影响力。山西侯马上马春秋晚期墓曾出土北方式青铜器，西安半坡战国墓出土动物纹铜杖头，甘肃庆阳、宁夏固原、中卫一带的青铜文化中，则更多地表现出受匈奴文化强烈影响的特征。河北北部桑干河河谷一带，如延庆的葫芦沟、怀来北辛堡等地的北方民族文化中，与早期匈奴文化也有着突

出的相似之处，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是十分密切的。以至于有些学者把它们统称为“北方系青铜文化”，把它们极具共同特色的青铜器称为“北方式青铜器”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甘肃清水县刘坪春秋晚期秦墓出土虎食羊金箔饰片，虎身饰平行条纹间“V”字纹，虎的形象也同于北方草原青铜器和岩画中的动物纹，而不同于中原地区青铜器和玉器上的虎纹，这种特别的“V”字纹样在北方草原阴山、贺兰山等地岩画中十分流行，延续的时间也较长，是北方草原固有的艺术手法。值得一提的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普遍使用的炊具—青铜镬，是匈奴文化典型器物之一，也在秦国境内广泛传播，很多学者认为青铜镬的起源是在中国的北方。不论此说是否成立，它的广泛传播都说明中原与北方民族早在春秋以前就有直接的接触。2001年在西安北郊出土的一座战国晚期秦人墓中，在头前和两侧放置的40余件随葬品中，有5件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饰牌模具陶范，图案有奋蹄奔腾的骏马、温驯静卧的绵羊、母子相拥、雄鹰搏虎等图案，十分精美。这应是习染了胡俗的秦人遗物。在内蒙古西沟畔M2战国匈奴墓葬出土的虎豕咬斗纹金牌饰上镌刻有汉字铭文“一斤五两四朱少半”、“故寺豕虎三”；“一斤二两廿朱少半”；七件银虎头节约上有汉字“少府二两十四朱”等^[3]。有学者认为是战国秦王室专为匈奴贵族或销售给匈奴人而制作的，西安出土的5件范具可以作为这一推论的一个有力证据。

二、匈奴帝国时期的文化分布与传播

秦末农民起义，秦无力北顾，冒顿单于于公元前209年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军事性奴隶制政权。汉朝初兴，国力羸弱，匈奴一度将汉高祖刘邦围于平城白登山七日之久，汉以财物贿赂匈奴阏氏方得解围，但侵扰仍在继续。匈奴帝国收回河南地，深入长城以南，不断掳掠，成为汉朝边境的最大威胁。但汉匈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并没有阻碍双方的文化交流，这一点在早期遗存和高级贵族墓葬中尤为明显。如准格尔旗西沟畔M4（西汉初）、长安客省庄M140（汉武帝以前）、陕西铜川枣庙M25（西汉）、宁夏同心县倒墩子（西汉中晚期）、李家套子（东汉前期）、辽宁西丰西岔沟等墓葬都包含大量匈奴文化因素。而新疆巴里坤县、哈密发现的匈奴文化典型的石砌墓、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应与匈奴向西域的扩张有关。

匈奴帝国最强盛时期，其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也十分广泛。长安客省庄、陕西铜川枣庙、西安北郊都曾发现匈奴墓葬，陕西神木、陇县、榆林、延安也屡有出土匈奴文物，西安东郊王许墓出土动物咬斗纹铜饰牌，山西朔县汉墓就发现过匈奴特色的鎏金铜饰牌和大量的水波纹陶罐，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具有匈奴风格的金带扣和一件金羊头饰件、山东洛庄汉墓9号坑发现的纯金怪兽、出土马具2件当卢、匈奴风格的动物纹饰牌甚至远播及两广地区，南越王墓出土10件牌饰和带有熊图案的铜扣，广州郊区南越国官吏墓出土6件，广西贺县出土2件，平乐银山岭出土1件，时代一般都在西汉前期，反映出这一时期匈奴文化强大的渗透力和传播力。

总之，这一时期墓葬所表现出来的广大地域范围内文化面貌的共同性、一致性以及各地区之间差异性和独特性，充分反映了匈奴帝国极盛时期各部落联盟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归属感。但在帝国征服和各部落融合过程中，各地原有的传统文化因素仍然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发展，从而展现出多元的、既相互认同又相互区别的文化特征。这与历史文献记载的东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平定楼兰、乌孙、乌揭各族，侵燕、代、悉收秦前所取匈奴地以及匈奴政治中心北移等事件相一致。

游牧帝国骤盛骤衰的特点在匈奴历史上体现的极为鲜明。在汉武帝数次战争的打击下，西域被汉朝控制，漠南和西部领土损失惨重，先是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降汉，祁连山河西走廊成为汉的河西四郡，河套地区河南地被汉将卫青、霍去病夺取，汉置朔方郡，单于庭退出漠南，西汉中期以后，这里的考古发现都已是汉文化的特点，匈奴文化的影响范围已大大缩小。漠南匈奴遗存缺少城址和居址的发现，而蒙古和外贝加尔却多有发现，这与西汉中期匈奴帝国政治中心的北移有关，因为失去了中国北方地区这一南下贸易和劫掠的根据地，匈奴才可能不得不建立一些定居的农业、手工业基地，以补充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用品。而在此之前，因为拥有长城地带这个桥梁，其粮食物品的主要来源是汉的进贡、与汉的贸易以及掠夺。

国内外匈奴考古所取得的丰富的实物资料为我们

重新勾画出历史上匈奴民族在立国前后的疆域变迁，以及在扩张、掠夺过程中曾经留下的足迹，通过研究分析匈奴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因素播及的地区和时间，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描绘出匈奴民族的起源、匈奴帝国统治的疆域及其征服的领地和附属部族的范围。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匈奴的疆域和活动范围也时时处于变迁之中，其政治统治中心，从先匈奴时期直到匈奴帝国建立之初一直处于漠南阴山地带，在匈奴的最强盛阶段，漠南作为连接匈奴与秦汉之间关系的纽带，其中心地位一直是十分突出的，不论史籍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匈奴在汉的打击下，统治中心北移至漠北蒙古高原，蒙古境内大量贵族墓葬以及城址宫殿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它在匈奴帝国时期所处的中心地位，而漠南的政治地位逐渐让位于汉匈之间的双边关系和经济交往。

在以往的有关汉匈文化间的交流问题的研究中，一味强调大汉对匈奴的影响、匈奴在诸多方面对汉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仰赖，而完全忽略匈奴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基于游牧经济而产生的快速广阔的传播和渗透力，忽视了匈奴文化在强盛时期对汉和其他民族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对这一民族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色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缺乏认识的。通过梳理内蒙古、陕西北部、新疆、甘肃、青海以及中原地区零星发现的匈奴文物，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匈奴文化繁荣时期对外的影响、交流和扩张，对这一文化的地位给予重新估价。在匈奴历史的不同阶段，匈奴文化的传播势头及其与周围文化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在其势力上升阶段，作为强势文化，它呈现出扩张、主动影响的趋势，当文化渐呈弱势，它就表现出萎缩、被动接受影响的态势。

注释：

- [1]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卷11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2] 乌恩：《匈奴族源初探》，《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2页。
- [3]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考古》1980年7期。